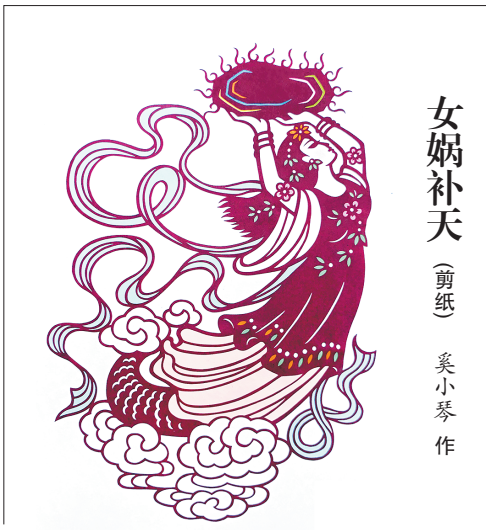


编者按:郁元宝教授最近发表了论文《汪曾祺留给上海的一张文学地图》,详考汪曾祺与上海的亲缘关系,填补了“汪学”空白,也丰富了海派文学的内涵。郁教授现在论文基础上再作适当增删,以飨《夜光杯》读者。

1946年8月至1948年3月,汪曾祺在上海度过了一年零七个月,其中一年零六个月(8月除外)由文学界前辈李健吾介绍,在私立致远中学教书。

李健吾弟子高宗靖于1941年捐资盘下“育华中学”,在此基础上创办私立致远中学。新学校就设在育华中学原校址。1945年抗战胜利后,也是通过李健吾的关系,该校一度聘请上海市教育局局长顾毓琇做董事长。麻省理工学院电工专业博士顾毓琇早年是文学研究会会员,清华大学文学社戏剧组主席,用笔名顾一樵先后创作过多部话剧,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占有一席之地。顾并非与李健吾交好,遂爱屋及乌,对其学生的私立中学也有所庇护,高宗靖本人具有长期教学和办学经验,也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话剧界颇有声望的演员(艺名“夏风”)。教育和话剧双栖,是顾毓琇、李健吾、高宗靖的共通之处。

高宗靖(1915—2007)籍贯湖北麻城,1934年毕业于上海市立敬业中学高中部普通科,旋即考上暨南大学。1938年毕业于暨南大学历史地理



女娲补天 (剪纸) 奚小琴作

已毕业的乌南幼儿园毕业生想想哥哥,心系幼儿园的弟弟妹妹,他通过妈妈询问我,弟弟妹妹们“对培育蝴蝶是否感兴趣”,我给予了肯定的答复。我也很好奇,想想所说的“蝴蝶盲盒”会培育出怎样的蝴蝶呢?过了几天,想想在妈妈的帮助下寄来了“蝴蝶盲盒”。

正值春天,万物复苏,草地上也时不时飞来几只蝴蝶,孩子们对“蝴蝶盲盒”满是期待和兴奋。在春光的沐浴中,他们结伴来到园长室,各班挑选了几个带回教室。

“园长妈妈,蝴蝶真的会从这里飞出来吗?”“它要多久才能长大呀?”孩子们的眼睛亮亮的。

可是一

的“李维廉”三人住一间,“我和一个在《大晚报》当夜班编辑的姓江的老兄住另一间”(此君也是校外借住者)。倘若这段描写属实,汪曾祺顶多只能算“听水斋”五分之一斋主。

汪曾祺到上海不久结识的青年文友黄裳的回忆跟《星期天》有关细节基本吻合,“房内只有铁床两只,床底铁条下陷,难怪永玉借宿时有小儿陷入窝内之感。一桌一灯,就是曾祺起坐之处。”既云“铁床两只”,说明这间屋子住了两人,“一桌一灯”归两人共用。幸亏同屋并非该校教员,且做着夜班编辑,昼伏夜出,晚上“一桌一灯”归汪曾祺独用的概率更大一些。

除了“听水斋”,汪曾

祺在致远中学还有一处栖身之所,就是“‘教学楼’对面的铁皮木棚”。他平时在那里“批改学生的作文,写小说,直到深夜。我很喜欢这间棚子,因为只有我一个人。除了我,谁也不来。下雨天,雨点落在铁皮顶上,乒乒乓乓,很好听。听着雨声,我往往会想起一些很遥远的往事。但是我又很清楚地知道:我现在在上海。”比较起居之所“听水斋”,汪曾祺更喜欢这间“铁皮木棚”。他在上海时期许多作品都写于此处。

“汪迷”们一度不易分辨“听水斋”究竟特指那两间门前小天井经常被人家高空泼水的教员宿舍,还是夜晚为汪曾祺所独占、下雨天也能听到雨点“乒乒乓乓”落在屋顶的这间“铁皮木棚”。黄裳的回忆也分不清究竟哪个是“听水斋”,索性将二者混合起来。如果“听水斋”也指这间“铁皮木棚”,汪曾祺就是名副其实的唯一的唯一主人了。

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太子太傅陈宝琛罢官乡居,在福州鼓山涌泉寺旁修建“听水斋”,据说形似石船,上下两层,可听流水潺潺。陈氏自述“年未四十作沧趣、听水二斋以娱亲”,但并非只为“娱亲”,他也自号听水居士、听水老人,以“听水斋”为题写过不少诗。汪

周过去了,孩子们却发现这个装着蝴蝶蛹的透明盒子里没有任何动静。大家就去收集了各种各样的信息,包括与AI对话,还通过老师、父母请来了生物学专家进行辅导,了解蝴蝶的蝶变诞生。

当他们得知蝴蝶孵化需要15℃—25℃的温度,纷纷建议“我们不是要给它一个更适合的家”。有的说要用积木、纱幔给蝴蝶造个房子,有的要把家中的保温箱带来。各班用自己的资源、材料建造着各种各样的蝴蝶住房。其中一个班级把蝴蝶蛹放在保温箱里,并铺上一些棉花等材料。看着他们认真忙碌的模样,我突然意识到,这个小小的盲盒,已然在孩子们心中

在网络浏览中发现了郭沫若的书《李白与杜甫》,我和它久违50年了!马上下单购得,书一到手马上翻阅,联想起当年乌兰布和大沙漠的岁月。那是“文革”中出版业大萧条无书可读的劫难年代,我来到内蒙古西部乌兰布和沙漠当建设兵团“知青”,除了领袖语录和著作,好久没有读到别的书了,更别说有机会接触新的文史类著作——那属于要被这场“大运动”扫除的东西。

突然有一天,应该是在1972年春夏之间,母亲给我寄来了郭沫若新著《李白与杜甫》,这是他漫长创作生涯中的最后一部书,1969年落笔,成书于1971年秋天。我感到万分惊喜,一连几天收工后就读它,而且读了两遍。当时真是郭沫若的博学强记而惊叹。他旁征博引,调动众多与李白、杜甫相关的文史资料,考证李白出生在当今的吉尔吉斯斯坦国境内,一下子推翻了我少年时知道李白生在四川的印象。我还佩服作者思想的新锐,70多岁了,置

曾祺以“听水斋”作为他在致远中学居所的雅号,虽是自嘲,却也不失为苦中作乐的一种谐趣。

因“拙于经费”,汪曾祺来沪之前致远中学已取消高中部,1948年初春汪曾祺离沪之后才恢复;1956年致远高中部并入番禺中学,中学本部则从福煦路(今延安中路)成都北路口迁至与江苏路交界的华山路1164号。1960年致远中学改为长宁区财贸中学。1962年财贸中学停办,仍复名致远。1965年致远迁出华山路校区,拆并到法华路329弄43号新建的法华中学(一个月后改名为长新中学)。学校改来改去,高宗靖一直担任校长,直至1975年退休。2000年长新中学与复旦中学初中部合并为上海市复旦中学长新分校,2003年更名为上海市复旦初级中学。2007年高宗靖逝世,讣告即由复旦初级中学发布。

从1941年创立到1965年拆并,致远中学走完了二十四年的历史。汪曾祺1946年秋至1948年春在致远的短暂驻留无疑是这所私立学校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而在致远中学“听水斋”住过的一年零六个月也给汪曾祺个人生命带来不可忽略的一抹亮色。



二只、第三只……各班越来越多的蝴蝶破蛹而出,教室一角成了蝴蝶的乐园。

可是,孩子们又产生了困惑,蝴蝶喜欢住在我们搭建的房间里吗?究竟要不要放飞?奕泽说,“就让它住在保温箱里吧,我怕它出去会被小猫吃掉”;喧妍说,“我太喜欢它了,不舍得放走它,而且在保温箱里我们还可以喂它吃东西,出去它会饿死的”;柚子则认为,“要放走它,保温箱里的世界太小,外面的世界很大”;鸿宝也赞同,“我们已经看过了它很漂亮的翅膀,我想让更多的人看到它的美丽,欣赏到它的美”;友友认为,“人类的声音会影响它们的成长”……经过讨

在大沙漠里阅读《李白与杜甫》

钱江

身于遭受劫难的环境,还能以“阶级分析”观念解析1500多年前唐代诗人杜甫的诗歌和行踪。我当年也满脑子充斥这条思路,顺路阅读看得很顺畅,很是拜服,很想追随。

但是我读后有两个意见。一个如今想不起来了,还有一个是,既然作者在书的后半部分评析杜甫,对他的“阶级意识”“门阀观念”“功名欲望”都有批评,为什么同样的做法,在书的上半部里对李白不来此一番呢?我在给母亲的信中说了这个意思。母亲回信说,你不妨直接写信跟郭沫若谈谈。于是我真的整理思路,给郭沫若写了一封请教的信。但是这封信没有寄出。不是因为怕自己的观点站不住,而是写完信一读,觉得信纸上的字写得太差了,如何拿得出手?又凝神再抄了一页,还是不行。这时候才意识到写字

著名学者钟敬文先生、启功先生,生前都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两位先生共事五十多年,友谊很深。钟先生长启先生9岁,对启功这个“小老弟”爱护有加,经常“批评”他“不务正业”(指写字);启先生对钟先生更是极为敬重。二老都热爱古典诗词,经常在一起谈论诗词并时有唱和。

1997年,为祝贺

启功先生85岁生日,钟敬文先生写了两首诗《祝元白教授85寿辰二首》,诗曰:“诗思清深诗语隽,文衡史鉴总菁华。先生自拥千秋业,世论徒将墨法夸。”“长忆戴诗小乘巷,千金一字信吾师。世间酒肉多征逐,俗态纷纷岂足嗤。”在诗中,钟先生对启功先生的诗文、学术成就予以高度评价,对启先生的诗艺尤其推崇;同时也为世人对启先生的误解而深感惋惜——先生所为,是传之千秋万世的大业,可是世人的一般舆论却只夸奖您的书法,这实在是对先生成就的遮蔽。这两首诗很有名,特别是第一首,常常被人引用。当然,在网上和不少书刊上流传的第一首诗还有另一种版本:“诗思清深诗语隽,文衡史鉴总菁华。先生自富千秋业,世论徒将墨法夸。”比如赵仁珪教授所著《启功评传》,封底下印的就是第一个版本。我查阅过钟先生手迹图片,应为前面引用的那个版

本,也许正式定稿时又有改动。这不是本文要说的重点。本文要说的重点在下面。

启功先生对钟敬文先生的贺诗也有唱和——《钟敬文先生惠祝贱辰,次韵奉答》:“文字平生信凤缘。毫锥旧业每留连。荣枯弹指何关意,寒煖因时周溯源。揽胜尚矜堪撰杖,同心可喜入吟笺。樽前莫话明朝事,雨顺风调大有年。”在我所见的各种著作中,均把先生此诗当作对钟敬文先生《祝元白教授85寿辰二首》的和诗。连启功先生的助手侯刚先生也这么认为。在他的《启功(画传)》(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中,这样写道:“值得称颂的是1997年,钟老在九十四岁高龄时,曾赋诗二首,亲自送给启功,为八十五岁的老弟祝寿(下略)。启功收到钟老的诗,心情激动,当即奉答(下略)。”

2018年12月3日,“启功书友会”微信公众号又以【启功先生的朋友圈】钟敬文”为题,略加改动转发了这段文字。

侯刚先生作为启功先生的助手,他的意见当然很权威了;如果光看诗歌的标题,确实也看不出毛病。可是一读诗歌,就觉得不对劲了。第一,钟先

生,启功先生,生前都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两位先生共事五十多年,友谊很深。钟先生长启先生9岁,对启功这个“小老弟”爱护有加,经常“批评”他“不务正业”(指写字);启先生对钟先生更是极为敬重。二老都热爱古典诗词,经常在一起谈论诗词并时有唱和。

好坏与自信心有联系,心里怕郭老笑话,就把信纸撕了。

若干年后我在北京当了编辑、记者,有一次吃饭恰好和郭沫若故居纪念馆蔡震副馆长相邻,不由得在席间把这段往事说了一遍。郭先生听罢就笑了,啊呀一声说,你失去了一次机会,要是把信寄出去,按那时的情况,郭老说不定真的亲笔给你回信。听后不禁后悔当年的我缺乏勇气,将这个

机会错过,以后再也没有了。话又说回来,1977年考入大学以后,思想发生了不小变化,思维方式比以前缜密一些,对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有了更多认识,似乎有了更多不同意见。这些新的想法又促使自己去读更多的书,做更多的思考。这是要感谢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的。大学毕业时清理行装,这本书没有带到北京。为什么半个世纪之后还要把这本书买来再读一遍呢?那是为了审视自己走过的路。

生的贺诗,是两首七绝;而启先生的和诗,是一首七律,从形式上讲,首先就不对。第二,钟先生的两首诗,第一首押麻花韵(a),第二首押支思韵(-i);而启先生的诗押的是寒山韵(an)。既然是唱和诗,肯定是步前诗之韵的,这是最基本的要求,而且启先生诗歌标题中也写明了是“次韵奉答”;所以从韵脚上看,也不对。以先生的

的素养,不可能犯这样的低级错误。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么多年都没有人指出这个错误,我也一直没有找到答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2020年5月29日,我读侯刚、章景怀编著的《启功年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当我翻到第224页,“(1992年)7月26日”条下,赫然见到这么一条:“钟敬文先生作诗,祝先生80诞辰;合从释民说因缘。卅载京门讲席连。一夕雷霆同劫难,三冬文史各根源。小诗共喜吟红叶,芜语常劳费玉笺。闻道大椿八千岁,吾侪今日只羊年。先生即次钟韵奉和一首:文字平生信凤缘。毫锥旧业每留连。荣枯弹指何关意,寒煖因时周溯源。揽胜尚矜堪撰杖,同心可喜入吟笺。樽前莫话明朝事,雨顺风调大有年。”

原来如此!原来启功先生“次”的是这个韵,“奉和”的是这首诗,可是却被人张冠李戴,当作《祝元白教授85寿辰二首》的唱和诗了。这么明显的错误,这么多年都没人发现,还在津津有味地引用、传播。

解开这个谜底,我非常高兴。可是新的疑问又产生了。第一,钟诗中“释民”怎解?是否有误?第二,《启功年谱》中为何没有《祝元白教授85寿辰二首》?而且,启功先生对这两首诗没有唱和吗?好在不久之后,《启功年谱(增订版)》(2023年版)出版了,新版订正了原版中的不少错误,也解开了我的第一个疑问。“释民”为“释氏”之误;“释氏”是佛姓释迦的略称,也指佛或佛教。但是第二个疑问还是没有答案。



边看边聊